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文化产业发展的 中国道路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惠林 著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文化产业发展的 中国道路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惠林 著

G124
27

2004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胡惠林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208-05336-7

I. 文… II. 胡… III. 文化 - 产业 - 研究 - 中国
IV.G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021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先进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惠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4 字数 253,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336-7/G · 938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以创新为灵魂,构建国家文化产业体系

(这是五年前应《中国文化报》的约稿而写的文章,发表于2000年1月5日《中国文化报》的“产业论坛”上。可以说,它是我研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今天读来,觉得五年前思考的一些问题至今也还存在着,一些观点也还没有过时,自己的研究思路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过来的。现在把它抄录如下,并把原来被删除的内容补上,以还原稿的本来面目,作为前言)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全球性创新领域,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新的经济和文化增长点,正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展开,因而也就自然地成为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反复较量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也就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业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随着中美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的签署,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了:国家文化体制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之间的矛盾;国际文化竞争压力加大同国内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形态发育、准备不足

之间的矛盾；文化产业高速增长与文化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文化产业实践迅速发展与文化产业理论和人力资源准备不足之间的矛盾。面对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和迅速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必然要求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创新为灵魂，全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产业体系，已经成为克服和解决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文化产业政策系统创新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建设首先是个政策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政策的定位一直在“文化事业”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以文化事业为主要政策目标的文化政策体系和国家文化制度系统，特别地突出和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系统的建构和功能的强调，是和我国的国家文化权利系统运作相一致的，因此，无论就文化政策理论、文化政策系统，还是文化政策形态而言，文化产业问题的提出，都构成了一个和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文化政策关系，而这种政策关系的出现，又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相适应的，实际上是我国文化政策体系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国家文化系统的建设出现了新的重大战略转型，而且，也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文化权力运作机制和国家文化管理，开始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创新过程，以适应国家新文化系统创建的需要。

然而，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已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严重滞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迄今为止，我国还尚未就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制定较为明确、系统、完整和科学的文化产业政策，缺乏一个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和战略需求关系之间的总体规划，已经出台的也由于政策内容本身的局限性而导致执行上的变数过大，

事实上形成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不到位,难以有效地发挥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应有的指导、监督功能和政策效用。从而使我国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同时,缺乏足够的国家文化政策力的支撑,尤其是在一些较为敏感的文化产业领域,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严重滞后,以及现有还在执行的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极不适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这种因素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实行市场准入机制所将承担的义务,构成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矛盾倘若不能尽早地得到解决,建立起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效的政策系统和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系统,那么,中国文化产业不仅在国际竞争中得不到应有的合法性支持和保障,而且还会使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文化产业失去它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在当前各地都在规划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时,统一的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特别迫切。

因此,以全面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为目标,加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系统研究,尽快完成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决策机制,理顺各种文化权力关系和文化政策关系,制定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化政策创新,改善和优化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政策生态环境,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以经济利益关系战略性调整为目标的国家文化产业制度创新

文化产业不仅是个政策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经济关系问题,反映和体现了一定文化经济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由于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格局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实行文化

事业管理的产物,反映的是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单一投资主体关系,因此,虽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已被打破,但是新的文化经济体制并未建立起来。文化企业的产权关系还未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理顺,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也还远未得到真正的确立;同时,由于原有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文化权力关系格局还依然存在,并日益显露出与文化经济格局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以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新文化产业垄断主义,而这种垄断又由于其本身缺乏应有的市场基础,因此,并未在总体上形成对国家文化产业创新的整合优势,从而不仅造成了国家文化产业资源的严重流失和巨大浪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滋生文化腐败的温床,进而造成了一方面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国家文化产业在整体实力上又还很弱小的十分矛盾的状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以至国家文化产业系统在面对来自全球化的挑战,抵御境外强势文化商品的入侵方面,缺乏应有的抗力。

以条块分割、行业壁垒为特征和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单一性体制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落后性,已经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的先进性要求构成了尖锐的对立,阻碍了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当前我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要求:一是贸易和投资主体的自由化;二是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这将在中国加入WTO后深刻地表现出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将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领域集团军式的全方位挑战。

因此,构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必须全面地对我国现有文化产业结构和投资体制进行战略性调整和重组。以文化企业为中心,打破以条块分割、行业壁垒为特征的、有碍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落后体制,对现有文化产业投融资

体制进行深度改革,在对外实行文化产业市场准入的同时,大力推进国内文化产业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准入,打通行业壁垒,借鉴国际经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组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跨行业的文化产业集团和文化跨国公司;丰富文化产业创新主体建设的内容,鼓励和允许社会办文化产业,特别是核心文化产业,实行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民营化、公共化战略。把过去一直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承担的责任和提供的服务,转移给民营的社会力量去完成。以公共的文化力量来共同构筑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政策性阐述,理应成为我们克服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矛盾,构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依据。

三、文化产业理论创新

文化产业创新,必然构成对原有的关于文化发展的知识系统和能力系统的怀疑与挑战,要求观念更新。观念更新只有通过新的理论系统科学而全面、生动地体现出来,才能形成对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支持作用。我国当前的文化产业形态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在实践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的层面上,都带有明显的原生态的痕迹。产业观念落后,理论储备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能力的扩张。面对来自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关于文化产业理论思维和理论的指导。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却没有对此表现出和达到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对于西方有关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理论的搬用,不仅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在理论创新的源头,出现了一种

能力弱化和能力依赖,一种价值标准的缺失,而且,还使得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思考和创造,失去了它应有的中国价值和原动力。这样一种文化学术生态,很难使我们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理论具有创新价值,很难做到我们关于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理论具有前瞻性眼光。中国的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不能没有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创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理应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危机应对和防范的主要智力力量,成为国家文化产业长远谋划的战略资源。

因此,要全面地构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增长,就必须着眼于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和理论的创造,克服对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依赖,创造属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新概念、新理论、新学说,回答和解决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给当代文化产业实践以理论指导。只有在元理论的意义上获得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创新能力的拥有,才能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创源头,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建立提供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理论形态的全面支持,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才能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创造出中国体系。

目 录

前 言 以创新为灵魂,构建国家文化产业体系	
第一章 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1
一、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性兴起	1
二、中共十六大论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的重大发展	8
三、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2
附录一:战略性调整中的中国文化产业 ——2003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18
第二章 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运动	39
一、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构成的文明方式	39
二、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构成的文化关系	41
第三章 文化产业与先进文化建设	47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实现方式	47
二、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来抓	53
第四章 中国“入世”与文化产业发展	57
一、中国“入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冲突和整合	57
二、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若干问题	65
三、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制度创新	76
四、“走出去”——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	84

附录二：长沙市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之一	90
第五章 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	109
一、文化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	109
二、文化发展战略选择与文化产业战略制定	121
三、文化发展战略的文本构成、类型和模式	145
附录三：温州 2000—2015 年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2000 年 7 月)	150
第六章 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	178
一、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增生	178
二、当今世界的软力量竞争与国家文化安全主题	185
三、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国家文化安全意义	192
第七章 开放条件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	198
一、综合文化国力西强我弱态势将长期存在	198
二、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冲突将进一步上升	201
三、文化产业发展将遭遇整体性全球战略挑战	204
四、国内区域文化发展不稳定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206
五、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将更趋复杂多样	210
第八章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213
一、对文明进程与现代化的文化误读：文化生态 安全	213
二、网络文化崛起与数字化侵害：文化信息安全	215
三、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危机：文化遗产资 源安全	218
四、文化市场非对称开放与国家文化公害：文化 市场与公共文化安全	222
五、行为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审美危机：文化内容 安全	226

六、知识产权与文化技术标准缺失:文化技术安全	234
第九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选择	238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建设	
问题	238
二、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发展观	240
三、建立积极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	244
四、以公共的力量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250
五、加快国家文化外贸体制改革	254
六、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	256
第十章 文化体制改革与国家文化制度建设	261
一、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	261
二、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	
文化执政能力	272
第十一章 中国和平崛起与文化大国战略	280
一、和平崛起与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理念	280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与国家文化安全战	
略需求的调整	283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使命与国家文化安全战	
略目标	286
四、文化大国战略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	287
五、文化大国战略的若干原则	288
后记	294

第一章

中国文化产业的 兴起与发展

一、 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性兴起

1.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性变化。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问题是在中国文 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而逐渐地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凸现出来,并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领域里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中国因循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随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国有和国办文化的文化体制。虽然,一定的以市场形态存在着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依然存在,文化商品流通领域实际上也客观地存在着,以经济核算为单位存在着的新华书店发行所,电影发行公司,客观上起着文化商品流通中介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文化领域基本取消了其他非公成分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因此,所有关于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也都纳入了计划经济的统一模式之中,即国家生产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

和流通什么。文化生产并不是根据市场需要和消费的需要,而主要是根据政治任务的需要来安排,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并没有自己自主的文化选择权。客观上存在着的文化市场,由于被纳入了一种静止的计划状态,无法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由于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市场竞争。统购统销的供给型、福利型文化管理模式,使国家成为文化商品生产惟一的投资方、惟一的受益方,同时也是惟一的风险承担方。政府承担了文化商品生产和文化市场所有的成本和风险。一切关于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是在文化事业的政策范围内被社会认知和运作。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成为国家办文化的惟一主体。文化产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思维与规划和管理中获得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存在形态和合法性身份。尽管我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有关文件中,也曾经正确地使用过诸如“电影工业”这样的科学概念,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建设却一直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所困扰,而没有获得其生长与发展应有的形态和合法性身份。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而且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动:音乐茶座和营业性舞厅在中国南方城市的兴起,使得文化娱乐业在中国重现;演员“走穴”使少数文艺人先富起来,推动院团体制的改革;图书零售业的放开,使得国有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国家不再包揽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事务。文化发展的理性回归,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建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和迷乱: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一方面又使得中国文化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新的生长形态。文化娱乐业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精神消费的需求,而且还改善了一方的投资环境,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税源丰富和税种的增加,使得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文化巨大的经济能量。音像业

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消费理念,而且还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提供了新的题材。电视业所创造的巨大利润给电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化产品形态的变化,标志着市场主体的变化和文化消费形态的变化,而由所有这些变化所孕育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性变化。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机制,受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理念已经再也不是政府的“统购统销”完全单一的福利性的文化事业了。自主选择、市场导向、消费需求和利润目标,成为市场主体的动力机制,文化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新的运动形态和存在方式。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政府办文化格局的转变,使得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形态转型。文化产业这一全新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与文化存在形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价值原则在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领域里的全面推进,文化市场的不断扩容和开放而被人们认识和发现,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两大主题之一。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提出要“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2001年3月,这一建议被正式写进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从而使得文化产业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形态,获得了合法性身份。

然而,文化产业形态在中国的迅速发育,并未同时有效地带动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反,当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进入中国大众的主导文化生活时,中国的学界却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化研究的贵族心态,迅速地使中国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与实际拉开了距离。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长期缺失,使之严重地滞后于中国文

化产业发展的实际。而文化产业在迅速扩容、延伸及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迫切希望得到关于它的理论指导,而国家关于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制定更需要文化产业的理论成果的学术支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建设步入21世纪,文化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时候,文化产业形态丰富性的成熟展开,使得对它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冷战后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与世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

冷战结束后,全球力量对比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消失,而且也标志着一种曾经在苏联、东欧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地缘文化上的瓦解。这就使得原本相对均衡的国际文化关系和世界文化力量格局,在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和转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手。瞬间的突变导致了瞬间的政策无能。这种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导致的历史重心的位移,都可能使历史的前行改变它的方向和原创的动力源。对象存在性的丧失,意味着为对象而存在的对象战略变得毫无意义。长久以来,冷战赖以建立的关于意识形态之争变得不重要了,为这一主题服务的整个国家文化机器,它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必须寻找新的战略出路和新的战略对象,服务于新的战略需要,并以此来构筑新的战略优势。以冷战为主题而形成的世界文化秩序应当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格局的巨大变动中实现重建。在福山宣告“历史终结”后,亨廷顿站在“防卫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立场上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揭示了这种重建的历史趋势,并勾勒了它

的未来世界文化图景和理论模型。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否如亨廷顿所描绘的那样进入“文明冲突”的时代并不重要,但美国政府确实调整了它的全球文化战略“大棋局”和政策趋向。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坚持要把文化产品列入服务贸易自由化范畴。在对华经贸合作中和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美国不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强行要求它的视听产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抬高中国人世门槛。这就使处在新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和判断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使得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前一直未加充分注意的领域——文化产品及其市场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关键性因素,而在这一领域,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舆论界、知识界,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在整个观念形态上,对于文化及其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在尝试着“文化市场”和“文化商品”的时候,率先出来反对“文化市场”和“文化商品”的并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考虑,而是知识界的学术性批判。对象的陌生性,导致了理论上的迷茫和政策选择、政策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大众文化”和被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概念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初,所谓“纯文学”与“俗文学”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对国际文化关系变动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需求这一全球趋势的隔膜,以及所谓“大众文化”及其产品运动在这一世界性文化秩序重建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量的整体性认识和判断的缺乏。而这也是导致“文明冲突论”出现后,中国学术界缺乏原创准备与之对话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完它 20 世纪最后一段历程,当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运动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文化关系格局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充分展开的时候,如何科学地认识、分析和判断文化、文化产业及